

赋形与枯竭：承认的政治如何吞噬了劳动的发生

承认劳动、命名劳动、保障劳动，为什么可能反过来耗尽劳动？文章提出“不足认性”：当制度赋形越过临界点，行动会从回应内部不确定性，转为完成外部可编码目标。出路不是撤回资源，而是建立制度主动不把一切照亮的“旁侧空间”。

作者 阳涌 · 约 3.0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3日

摘要

当前关于AI与劳动的主流论述，尽管在“岗位消亡”这一经验事实上达成共识，却共享一个未被审查的规范前提：只要制度肯“看见”那些被边缘化或被替代的劳动形态，问题就能解决。本文试图展露这一前提本身的悖论结构：制度对劳动的赋形——命名、度量、保障——在超过某个临界区间后，会系统性地抽空行动从其内部不确定性中自我推进的能力。这一悖论不是制度设计的偶然缺陷，而是“承认”这个概念在劳动领域的深层语法：劳动一旦被从外部指认为“某种劳动”并以精细化的方式配给资源，行动者原本在未被完全定义的混沌中摸索、试探、重新定义问题边界的那个过程，就会被“完成可编码动作”的外部目标所替代。由此，本文提出“不足认性”这一新辨别维度，其核心命题是：一种劳动形态越是能被圆满纳入制度的精细化承认体系，其生成性内核就越可能在“被承认”中被无声稀释；发生性劳动的持续，恰恰依赖于制度在承认上的某种克制——不是承认得不够，而是故意不将承认推进到全覆盖。本文重新阐释了“岗位”的发生史，揭示其为一场持续三百年的、承认分辨率不断上升的运动，并诊断这一运动在平台经济时代的极端化：算法的纳米级承认将劳动者的行为词典彻底重写。进而，论文批判全民基本收入和再培训方案——它们不是补救，而是以不同方式在“承认/赋形”的语法内运行，因而各自内置了枯竭的风险。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旁侧空间”政策框架：制度不应致力于“公正地看见一切劳动”，而应有意识地为自己划出不被顶灯照射的领域——不是在阴影里保存一个浪漫化的“本真”，而是防止承认机器的精细化惯性在效率最优化的驱策下系统性地覆盖掉所有尚未收敛为新形态的混沌。文章以证伪条件收束：若在实施旁侧空间政策二十年后与仅推行精细化承认改革的对照组相比，受益群体的非任务导向探索行为总量与新型协作形态的生成率均无显著差异，则本文的核心命题需要修正。

关键词：赋形与枯竭；不足认性；发生性劳动；承认的自反性；旁侧空间；劳动的发生学

一、承认的悖论：为什么“被看见”可能恰恰是枯竭的开始

让我们从一桩看似平静的“进步”说起。

2011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第189号《家庭工人体面劳动公约》，首次将无偿家庭照护明确界定为“劳动”。各国统计部门陆续开始在利用调查中单列“无酬照护”条目。学术界的共识越发清晰：照护劳动——照料幼儿、陪伴失能老人、协调家庭成员的精神需求——是社会再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价值长期被经济统计与国家福利制度系统性贬抑、私人化、隐入“私事”的暗箱。

承认照护为劳动，在道义上是不可辩驳的进步。但本文想追问的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当一桩行动被制度命名为“劳动”并为之配给资源之时，这桩行动本身的性质，是否会因为这一“被承认”而发生某种不可逆的改变？

这个问题不是空穴来风。在那些照护劳动已被高度正式化的福利国家——瑞典的居家护理津贴制度、日本2000年以后的长期照护保险——可以观察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制度化的照护评估体系要求将照护活动切分为一系列可记录、可审核的动作单元：协助翻身（每次多少分钟）、备餐（每餐多少时间）、外出陪同（每周多少小时）。照护者在完成每个可编码的动作之后，需要在系统中做记录——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向提供津贴的行政机构提供“劳动凭证”。

让我们跟随一位具体的照护者——姑且称她为和子，一位在大阪郊区照护失智婆婆十二年的女性——来观察这个机制是如何在日常中展开的。[1]

在日本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实施的头几年，和子欢迎它：她每个月可以领到照护津贴，第一次感到自己被公共制度“看见”。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套评估体系。照护管理师每三个月上门一次，记录婆婆的“日常生活自立度”——步行、进食、排泄、入浴，每项按五级评分。和子需要配合填写照护日志，记录每天的服务内容。

和子在照护中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是深夜握着婆婆的手。婆婆在失智后经常在凌晨醒来，陷入剧烈的焦虑，以为自己是幼年被寄养在别人家的小女孩，反复哭喊“我要回家”。和子最初会开灯、跟她解释“这就是你家”——这并不能安抚她。后来和子发现，什么都不说，只是躺在婆婆旁边，握着她的手，让她摸到自己手背上的老人斑，她会慢慢安静下来。这个过程有时二十分钟，有时接近一小时。它在照护日志里找不到准确的编码——它不属于“身体介护”（协助进食、排泄、入浴），也不属于“生活援助”（打扫、洗衣、做饭）。照护管理师对和子说：“你可以填进‘陪伴’，但陪伴不算在津贴点数里。”

和子面临的是一个日复一日的、微小的选择：继续握那双手——这意味着她需要为此付出不计入津贴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本来可以用来做那些“有编码”的、能计入点数的动作；或者，把深夜的时间压缩，确保自己第二天有精力去完成那些能计入津贴的“身体介护”项目。她不是在被迫，她

是在被一整套温和的反馈梯度逐渐重塑她的行为生态。第一年，她仍然每夜握婆婆的手，照护日志里“陪伴”那一栏空白。第三年，她开始感到疲惫——不是握手的疲惫，而是“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做了无法被看见的事”的疲惫。第五年，她不再每夜都去。不是因为不再关切，而是因为那些未被编码的动作在她的行为排序中，被那些能被记录、能换算为津贴的动作，慢慢挤到了边缘。

但这仅仅是故事的一半。比行为层面的“挤出”更隐蔽的，是一种认知层面的枯竭。当和子每天花费精力去识别哪些动作“可编码”、哪些“不可编码”时，她的注意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的注意力从“捕捉婆婆的即时状态”——她此刻的呼吸节奏、手指的力度、喉咙里那种特定的呜咽声——逐渐转向了“扫描可编码动作列表”。这一转向意味着，即使她仍然握着婆婆的手，这只手也正在从一个“向她传达婆婆内在状态的身体”，变成一个“无法为她积累点数的身体部位”。她握住它的方式可能还是一样的，但她将不再以同一种方式倾听它。她不再能辨认出那些在过去十二年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只有在这个具体情境中才会出现的细微线索——因为辨认这些线索所需要的，恰恰是一种不被“可编码动作列表”过滤的、悬浮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她在内心对自己做的事情也在重新叙事。最初，她是“懂婆婆的人”——这个词不是任何外部话语给她的，而是她在长期的摸索中自己凝出的、支撑她走过去的自我理解。但当评估体系将她的行为逐一切割、归类、计量之后，她的自我叙事逐渐滑向另一个方向：“我是一个合格的津贴领取者。”这个新的叙事不残忍。它甚至是积极的——它让她感到被社会承认。但它同时把“好照护”的标准从“婆婆的身体在那一刻平静下来”替换成了“津贴点数积累够了”——而被替换掉的，正是她从内部获得行动方向的那个来源。

和子的故事不是一个孤例。它展示了一个本文将要贯穿始终的悖论结构：承认机制——给它一个名字、一套度量、一条获得保障的通道——从不冷酷地说“你不许握住她的手”。它只是用津贴的差别化与评估的频次，温和地、持续地重塑照护者的注意结构、成功标准与自我叙事，从而让那些无法被编码的动作在行为生态中慢慢凋零。和子对婆婆的关切没有消失，但它与“握住她的手”这个具体动作之间的内在联结，被悄悄地解离了——动作还在，但动作的发生源从“婆婆的痛苦在和子身上唤起的即时回应”，变成了“在可用时间内、在有编码的动作列表中、选择一个还能做的事”。

这桩案例暴露了一个深层的悖论结构，它远远超出了照护的范畴。本文的整个论证将围绕这个悖论展开，并最终给它一个名字。这个悖论可以表述为：

制度对劳动的赋形——给它一个名字、一套度量、一条获得保障的通道——在超过某个临界区间后，会系统性地触发一种对劳动的发生性的枯竭。

这里“发生性”一词，在本文中严格界定为：一桩行动在多大程度上由其内部的不确定性驱动，而非由外部已定义完毕的目标所引导。这个界定可以同时覆盖创造性探索（问题边界不确定：创造者还不知道要做出什么）和情境化照护（回应方式不确定：和子不知道下一秒婆婆会发出什么信号）

，并将它们统一在“内部不确定性”这个核心之下。所谓“枯竭”，指的不是行动停止了，而是行动的方向源从内部不确定性转移到了外部既定目标——行动仍在继续，但它不再能从行动者与情境的内部互动中重新定义自己。

这个悖论不能用“承认得还不够”来解除。承认得再多——更细致的动作分类、更精确的时间记录、更个性化的评估量表——只是在同一根轴上加强赋形。赋形越精细，行动被从外部定义得越彻底；行动被定义得越彻底，其内部的、由不确定性驱动的自我推进就越被挤压。这不是一个可以被“优化”的技术过程。它是一个结构性的拮抗关系。

为了将这一拮抗关系从道德直觉提升为可操作的分析工具，接下来必须把它从具体案例中剥离出来，确定它的逻辑核心、哲学根基与辨别效力。这个核心，本文称之为“不足认性”。

二、不足认性：一个不可还原的辨别维度

2.1 概念的奠基

“不足认性”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试图在既有学术疆域中切分出不可还原的新辨别面的严格概念。为建立其地基，必须先做几重剥离和对话——不仅是与那些支持本文的哲学传统，更是与那些最有可能“解释掉”本文核心命题的邻近理论正面交锋。

第一重剥离与对话：与自决理论的对质。这是本文面临的最危险的质疑：所谓“外部承认替代内部冲动”，是否只是心理学家早已熟知的“挤出效应”——即外部奖赏损害内在动机——的政治哲学翻版？自决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Deci & Ryan, 1985）在过去四十年中积累了大量的实验证据：当一项原本由内在动机驱动的活动被引入外部奖赏、监督或评估时，个体对该活动的自发兴趣和持续投入会显著下降。这一效应的发生机制，在SDT框架中被解释为“因果感知点”从内部向外部的转移——个体不再感到自己是行为的发起者，而开始感到行为是被外部偶联事件所控制的。

[2]

本文的“不足认性”确实与挤出效应共享一个关切：两者都承认外部调节可以侵蚀内部发生。但本文试图切分的是挤出效应所无法覆盖的另一个层面。在SDT的实验中，外部奖赏被设计为独立于活动内容的附加物——你本来就在做这件事，现在我们额外给你一笔钱。问题是：承认的赋形不是在照护之外额外给一笔津贴，而是通过定义“什么算照护”反过来重构了照护本身的内容边界。在挤出效应的逻辑里，握手被挤出是因为握手的奖赏不够；在不足认性的逻辑里，握手被挤出是因为它根本不被承认为照护的一部分——它在承认的自体论排序中被降格为“不算劳动”。换句话说，挤出效应处理的是动机的转移，不足认性处理的是行动形态在社会自体论层面的等级化：承认不仅改变你“为什么做”，更改变“什么才算做”。

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如果一个照护者因为津贴不够而放弃握手，那是挤出效应——我们可以通过提高握手的津贴来修复。但如果在制度的本体论框架里，“握手”就不属于“照护劳动”这个范畴，那么提高别处的津贴只会让握手更加“不算”——这不是动机被削弱，而是握手的行动身份被制度取消了。它从“照护的一部分”变成“照护之外的额外善意”，而“额外善意”在制度配给的引力场里，天然地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

由此可以给出两个概念之间最硬核的机制性区分。面对“和子为什么不再握手”这个问题，挤出效应的解释链是：握手缺乏外部奖赏→握手的动机被削弱→握手行为减少。这条解释链在处理“外部奖赏”与“内部动机”之间的互动时是有效的，但它在照护的场景中恰恰断裂了——因为在这个场景中，首要问题不是“奖赏不够”，而是握手的行动身份被制度的命名体系取消了。不足认性的解释链是：制度将照护定义为可编码动作的集合→握手不在集合内→握手的行动身份从“照护的一部分”降格为“额外善意”→照护者的注意结构、成功标准与自我叙事随之位移→握手在行为生态中被边缘化。这两条解释链不可互换：挤出效应的处方是“优化激励设计”，不足认性的诊断是“承认本身所内置的赋形机制在超过临界点后必然会枯竭发生”。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前者是动机心理学，后者是社会本体论。

第二重剥离：与福柯治理术的辨析。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Foucault, 2004）中提出了“治理术”概念，揭示了现代国家如何通过统计、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一整套“仁慈技术”，将人口的生命过程纳入治理的精密计算之中。[3]治理术批判的长处在于：它看穿了那些以“关怀”“保护”“承认”为名的制度，实际上是把生命变成了权力运作的对象和资源。按这一逻辑，上文分析的照护评估体系就是一种典型的治理术：它不禁止照护者握手，而是通过将照护纳入可计算、可比较、可优化的行政网格，将照护者的行为塑造成治理的客体。

但本文的“不足认性”要追问的是一个福柯不曾充分追问的问题。在治理术中，权力通过承认来治理生命——承认生命的各种维度（健康、寿命、生育率），以便将它们纳入行政理性的调控范围；在这个过程里，生命本身被假定作为一种可以承受无限精细治理的素材。不足认性要揭露的恰恰是：发生性劳动并不是一种可以承受无限精化治理的素材。在劳动领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行动形态：它的活力恰恰依赖于它相对于治理的某种不可穷尽性——它只能在没有被完全定义的空间里自我推进。这并不是说治理术批判错了，而是说它漏掉了一个特定的机制：治理术追问的是“权力如何通过承认来治理生命”，不足认性追问的是“承认如何通过其赋形机制，在超过临界点后系统性地枯竭行动从内部重新定义自身的能力”。两者交叉，但不重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福柯在晚年的转向中——尤其是在《主体解释学》（1981-1982）中——已经触及了与本文的关切深度相关的议题。在那里，福柯探讨了“自我关怀”（epimeleia heautou）作为一种主体与自身的关系，如何在外部的权力/知识之外，开辟出不被治理术完全覆盖的生存维度。这似乎与本文的“内部冲动”形成了呼应。但本文要切分的恰恰是：福柯的“自我关怀”是伦理主体的自

我修炼——它需要外部引导（导师、哲学文本）来启动，其目标是构建一种不被外部规则完全支配的主体性。而本文所说的“发生性”不是伦理修炼，而是在劳动的日常实践中，行动者面对一个尚未被制度命名的具体情境时，从其身体里长出来的、无法提前在操作手册上写下的即时判断力——它不需要被教导，它需要的是不被过于精确的承认所覆盖的条件。这两者在“不被治理”这一点上有交叉，但它们所指认的过程、所处的领域、以及被伤害的方式，都不同。本文的切口不在“主体性修炼”，而在“劳动发生学的制度条件”。

第三重剥离：与迈克尔·波兰尼的“默会知识”和詹姆斯·斯科特的“米提斯”的辨析。波兰尼（Polanyi, 1966）说“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说出来的多”——骑自行车的人在物理公式写下之前就能保持平衡。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Scott, 1998）中展示了国家如何为了“可读性”而系统性地清除那些“米提斯”——那种在实践中长出来的、无法被标准化手册编码的实践智慧。本文的“不足认性”确实从这两脉里汲取了血液，但它要指认的不是“知识的难言性”，而是行动的发生性与承认的赋形性之间的本体论冲突。默会知识即使不可言传，仍可被行动者自己体知并运用——它不需要任何外部承认就能完好无损地存在。而“不足认性”要指认的是这样一个特定的脆弱时刻：当制度开始为一项行动提供承认和资源时，这项行动内部那个原先由不确定性驱动的发生结构，会因为外部既定目标的植入而发生什么样的变质。默会知识被编码会损失信息，这是认识论问题；发生性被赋形会损失自我推进的动力，这是本体论问题。

第四重剥离：与承认理论内部批判的对话。霍耐特（Honneth, 1992）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发展为社会正义的三重框架——爱、权利、团结——并将“承认的缺失”设定为社会病理的总根源。巴特勒（Butler, 1997）更进一步，指出承认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暴力的“主体化”——当我们承认一个人是“某种主体”（如“照护者”“难民”）时，我们同时将她裹入了一系列与之绑定的话语规范，这些规范在给予她存在论意义上的可见性的同时，也限制了她成为其他样子的可能性。马尔科（Markell, 2003）则系统地批评了“承认政治”的边界——任何以国家或制度为中心的承认框架，必然会在“可承认”与“不可承认”之间划出一条边界，而那些被划在边界之外的诉求，不仅在经验上被排斥，在逻辑上也被“承认”这个概念本身所消声。

本文从这些批判中汲取了血液，但要切分的是一条更窄的切口。巴特勒和马尔科处理的是认同层面的主体化暴力——承认把一个人锁定在“某种身份”之中，从而限制了他成为其他样子的可能。不足认性处理的是劳动行为学层面的枯竭——承认把一个正在发生的行动锁定为“某种劳动”，从而截断了它从内部重新定义自身形态的可能。两者同样揭示“承认的暴力”，但暴力发生的位置不同：前者发生在主体的身份认同上，后者发生在行动的形态生成上。

这一点在与马尔科的对质中最为清晰。马尔科批评承认政治的固定边界，但他的替代方案仍然在“如何重新划定承认的边界”这个语法内——即寻找一种更流动、更开放、更去中心化的承认方式。本文要论证的恰恰是：在劳动领域，这个语法本身就是问题。不是边界画错了，而是“画边界”这个

动作——无论画得多流动、多开放——都会在劳动的发生结构上产生一个不可消除的枯竭效应。这不是“更公正的承认”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制度性地保留一些不被承认的空间。马尔科追问的是：为什么你被划在边界的这一侧而我被划在那一侧？不足认性追问的是：为什么画边界这个动作本身，会系统性地损害被它纳入边界之内的事物的生成能力？这一区分，是本文与承认理论内部批判的根本分界线。

第五重剥离：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机制性对质。这是不足认性面临的最严峻的“被吞并”风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并非如某些简化解读所认为的那样仅指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异化首先是一种本体论结构：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分离、劳动过程与劳动者相敌对、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被降格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中介。这一结构既可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运作，也可以在苏联式计划经济中以“官僚制异化”的形态重现。因此，仅凭“不足认性在非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会发生”这一点，无法将它与异化区分开——因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本身的射程就不限于资本主义。

本文必须用机制的不可还原性来切割，而非用“致因不同”这一标准。面对“和子为什么不再握手”这个问题，马克思的异化批评会给出什么解释？答案取决于批评者选取的是哪一个版本的异化。如果是资本逻辑版，解释是：照护的商品化剥削了和子的剩余劳动，使她无暇握手。这条解释链在此断裂——因为和子的握手行为并不曾被商品化；她不因此而获得任何报酬，她停止握手也不是因为剥削加重了，而是因为未被编码的行为在制度反馈中被排序到了边缘。如果是类本质版，解释是：照护在标准化中被从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外部的、被动的操作。这条解释链更接近本文，但它的规范基准是一个预设的“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它假定在制度的扭曲之前，有一个应然的、完整的劳动形态存在。而本文的发生学恰恰不接受这个预设：和子握手的冲动，不是一个先于一切社会构形的“本质”在表达自身；它是在她与婆婆十二年共同生活、在无数微小的试探与回应中，从她的身体里生长出来的一种具体的能力。它的脆弱性，不在于它偏离了“类本质”，而在于它的生长条件——一种低分辨率的、留有大量不确定空间的社会构形——正在系统性地被精细化承认所消除。异化批判的保护对象是“人的本质”；不足认性的保护对象是“拮抗的条件”。

这条界线一旦画清，不足认性的不可还原性就不再依赖于“它处理的是一个不同层面”——那是分类学的防御，发现学的防御。发生学的防御是：当异化理论被推到一个它之前的各种版本都无法解释的边界案例面前时，它的解释链断裂了——而不足认性的解释链在此没有断裂，因为它不依赖任何关于“应然劳动”的先验预设。这一不可还原性，将在本文与具体案例的每一次碰撞中被反复检验。

2.2 核心命题与不可还原性校验

核心命题：一种劳动的发生性——即它由内部不确定性驱动而非由外部既定目标定义的程度——在超过一个临界区间之后，会因制度承认的精细化而系统性地衰减。承认不是越多越好：超过临界区间后，承认的每一次细化，都在以“保护劳动”的名义温和地将行动的方向源从内部不确定性转移为外部既定目标。“不足认性”不是“承认尚未到位”的暂时病态，而是发生性劳动得以持续的构成性条件。

不可还原性硬校验：请问，“不足认性”能否被某一个已有的学科概念用一句话1:1替换？

- 它不是“挤出效应”——挤出效应处理的是外部奖赏对内部动机的削弱，不足认性处理的是制度如何通过定义“什么算劳动”来取消某些行动的劳动身份，从而在注意结构、成功标准和自我叙事三个层面上重构行动者的行为生态。

- 它不是“治理术”——治理术追问权力如何通过承认来治理生命，不足认性追问承认的赋形机制如何在超过临界点后系统性地枯竭发生。两者的规范指向也不同：一个是“抗拒治理”，一个是“制度自限”。

- 它不是“异化”——异化的解释链在面对“无人强迫、未被剥削、但行动仍然枯萎”的案例时断裂；不足认性不预设“应然的劳动本质”，而是追问发生性劳动的制度性生长条件。

- 它不是“物化”——物化是对他人的承认遗忘，不足认性是承认本身的自反性：承认越精细，越可能伤害被承认的对象。

- 它不是“默会知识”——默会知识是认识论层面的难言，不足认性是本体论层面的枯竭：一个动作不是因为无法被言说而受损，而是因为被命名得太精确而被抽空了内部不确定性。

- 它不是巴特勒的“主体化”——主体化发生在身份认同层面，不足认性发生在劳动行为的形态生成层面：巴特勒追问“承认把你变成什么样的人”，不足认性追问“承认把你正在做的这件事变成了什么样的动作”。

- 它不是马尔科的“承认边界”——马尔科主张更开放的承认边界，不足认性主张在某些领域退出承认逻辑本身。

若将它压成五十字：“制度对劳动越精细地承认，行动的方向源就越容易从内部不确定性转移到外部既定目标——这是承认的自反性，不可通过更公正的承认来消除。”没有哪一家的现成概念能在一句话内涵盖从“承认的本体论自反性”到“行动方向源的转移”到“注意结构-成功标准-自我叙事的三重位移”这完整链条。这就是本文要打的那根新骨头。

2.3 不足认性的谱系：一个动态的相位分析

不足认性不是一个可以被静态测量的属性，它是具体的制度-行动互动中结算出来的、处于特定相位的关系性特征。因此，本文不用分类坐标来“定位”劳动形态——那样做会把流动的拮抗关系冻结为静态的病理标签。本文代之以一个动态的相位叙事。

任何一种劳动形态，在它所处的制度环境中，都可以被描述为处于“承认度—发生性”这对拮抗力量所构成的特定相位。承认度不是制度预先配给的一个固定量，而是一个具体的、正在发生的过程：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对这项行动进行命名、度量、并将资源的配给与命名的精细度挂钩。发生性也不是行动者的一个心理属性——它不是“内在动机”或“自主性”——而是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仍由其内部的、尚未收敛为外部既定目标的差异序列所驱动。

这两个变量不是独立的。它们在同一个过程中互生互制。当一项行动长期处于低承认度的相位时，行动者缺乏最低的资源支撑——她的发生性可能很高，但随时会因物质条件的匮乏而中断。这是未被看见的重复性苦役（如零工经济中被计件工资精密管理却不受任何劳动法保护的家政工）与野生发生（如未被任何机构资助的自由软件开发社群）所共享的困境。当一项行动被推进承认度开始上升的相位时——例如照护被正式命名为“劳动”——发生性首先会因基础资源的注入而获得推力：照护者有了津贴，可以不必同时打三份工，她终于有了时间去握婆婆的手。这是承认的支撑效应。但当承认的精细化继续推进，越过一个临界区间之后，替代效应就开始压倒支撑效应：承认机制的不断细化（更精确的动作分类、更精细的时间计量、更个性化的评估量表）将行动者的注意结构、成功标准和自我叙事逐步从内部不确定性导向外部既定目标，发生性沿着一条倒U型曲线的右翼开始下滑。

这个过程不是均匀的。它在不同领域、不同制度传统中具有不同的形态。在某些照护文化高度职业化、评估体系的颗粒度极细的制度环境中，替代效应可能很早就开始产生显著影响；在某些对“劳动”的定义保留着较大模糊性的制度环境中，支撑效应可能在一个更长的区间内占主导地位。但共同的趋势是：当承认的精细化越过最佳支撑区间之后，每增加一分精确，发生性就失去一寸生长的土壤。

这一倒U型关系，是本文的整个诊断的核心假说。它不是来自先验的推理，而是来自对具体历史过程——下一章将回溯的那三百年的岗位发生史——的观察与凝练。它同时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经验命题：在那些承认度极高的制度环境中，是否确实可以观察到发生性——行动由内部不确定性驱动的程度——的系统性衰减？本文将在第七章给出具体的证伪路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发生性”在此处的严格用法。它不是“内在动机”的同义词。内在动机是一种心理状态，可以通过自我报告量表来测量。发生性是一种行动所处的相位状态：它指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仍在回应其内部的不确定性——即某种尚未被命名、尚未被定价、尚未被编码为“最佳实践”的具

体的、与情境的即时互动。当和子在深夜握婆婆的手时，她握手的“发生性”不在于她“有内在动机去握手”，而在于这个动作所回应的——婆婆此刻的焦虑、她手心的温度、她呼吸的紊乱——全都是只能在那个瞬间被感知、无法被提前写进任何操作手册的信号。握手之所以是发生性的，不是因为它来自内部的某种纯洁动机，而是因为它所回应的那个现实，尚未被制度的光照提前定义。当制度的评估体系将这些信号全部以“不属于计点项目”的方式排除出照护者的注意结构之后，握手的发生性就在行为生态中被系统性地消解了——不是因为和子的内在动机消失了，而是因为那个只能被即时感知的信号，不再有人在倾听了。

三、岗位的诞生：作为一场三百年的承认分辨率不断上升的运动

3.1 前岗位时代的真正面目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劳动形态呈现出一种混合特征——生产、照护、创造、互助并不被明确地分隔在不同的制度格子里。工匠对手艺全程的掌控之所以可能，并非因为前现代制度善于“承认”它，恰恰相反，是因为前现代制度无力也不愿对它进行精细的赋形。行会并不给“创造性”颁奖，它只管手艺标准的最低门槛与市场准入；教堂并不把邻里间的照护登记为“志愿服务时长”，它只是在传道中把这事框为“善功”。那个混合态的存续条件，恰恰是承认的极低分辨率：没有一个人拿着一份“工匠创造力评估量表”在给工匠打分，因此工匠对材料变化的即时判断、对工具细微调整的试探，全都发生在制度灯照之外的阴影里。

但这并不意味着前岗位时代是一个“发生性自由流淌”的黄金时代。那些在阴影中存活的发生性，同时也被父权的家庭结构、师徒的人身依附、宗教的道德监控所塑形。这些同样是“赋形”——只不过它们不以国家的“承认”形态运作。本文的叙事因此不是一部“从本真到异化”的堕落史。它是一部“制度的赋形形态如何从分散的、人身的、低分辨率的旧形态，转向集中的、官僚的、高分辨率的新形态——而在这个转向中，发生性被枯竭的方式也发生了系统性的改变”的转换史。

3.2 工厂制：第一次赋形，第一次枯竭

工厂制的创新，用不足认性的语言翻译，不是“把劳动切成了碎片”，而是将劳动过程首次大规模纳入可被制度承认的范畴，并以承认的精细化作为管理控制的核心杠杆。工序分解不只是技术动作的切割——它同时是对每个切割出的单元进行命名、定价、监督的整套装置。计件工资制度是赋形的原始形式：每一单位劳动被配以一个价格，从而被正式承认为“有价值的贡献”。这一承认带来一个直接后果——此前由工匠内部自我维持的质量标准、节奏判断和工具调整动机，被外部定价系统大幅度替换。他不再需要判断一块铁是否打到了恰当的火候，他只需要打到能让监工通过并能计件的那个最低标准。

这里发生的就是本文所称的“赋形/枯竭”：一个动作因为被命名与定价而获得了生存资格（赋形），同时，它也因为这一外部定价而失去了其内部判断力的维系（枯竭）。布雷弗曼（Braverman, 1974）所说的“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在不足认性的视角下不止是控制权的剥夺，更是发生源的截断——工人不再从“完成一件完整的器物”的内部目标中获得行动方向，方向被转移给一个外部计件装置。当方向源被外化，劳动的自我推进能力就开始萎缩。

但这一萎缩不是瞬时的。在工厂制早期，工人仍然保留了大量“不足认”的实践智慧——他们知道哪台机器在什么转速下会颤抖，知道怎样在监工转身的间隙调整操作节奏，知道怎样在计件的缝隙里保留一点自己觉得“应该这样做”的手艺感。布洛维（Burawoy, 1979）在《制造共识》中捕捉到的正是这一层：即使在高度赋形的工厂制度中，工人仍然通过“赶工游戏”自发地创造出了意义空间与协作形态——他们的发生性并没有被赋形完全消灭，而是在赋形的内部裂隙中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生长出来。本文的“不足认性”必须容纳布洛维的这个发现，而不是无视它。承认的精细化并不制造一个全无发生的荒漠——它制造的是一个发生性被逼入缝隙的生态。问题不是“完全没有发生”，而是“发生只能在承认机器扫不到的边角里苟延残喘，且每一次承认的细化都在进一步压缩这些边角”。

泰勒（Taylor, 1911）的科学管理，在不足认性的视角下，是一次对劳动中一切残余的“不足认空间”的总清洗：每一个动作都被从工人身上抽离、分解、重组、标准化，然后以“最佳实践”的形式重新派还给工人。这个过程不只是在提高效率——它是在彻底将工人内部判断的可能性空间压缩至零。到了这一步，一个动作之所以被做，完全不再因为工人“觉得应该这样做”，而只因为“操作规程要求这样做”。发生源由此完成了从内部到外部的彻底转移。

3.3 福利国家：承认的分层化与场域的私人化

二十世纪中叶的福利国家在社会保险设计中，系统性地将女性的照护劳动私人化——将全职母亲设定为依赖丈夫雇员身份的“附属者”，其劳动不被统计、不受保障。用不足认性的视角重看，私人化并不是“不被承认”，而是被强制分配了一种特定的承认形态——“私人的、非劳动的、不属于公共资源配给范畴的”。这是一种消极的赋形：它命名了你做的事（“家事”），并以此命名为依据将你排除在积极赋形（社会保障、劳动法保护）之外。

这里暴露的不是“照护未被承认”，而是承认体系本身的双层结构：一层是积极赋形，配给资源；一层是消极赋形，配给不被保护的义务。照护者被卡在第二层——她被承认（她知道自己在做照护），但这种承认的赋形是“你做的事不配得到公共资源”，于是她的照护行为必须在完全没有公共支撑的私人领域里挣扎。在这种结构下，照护的发生性不会因为“被承认”而枯竭——因为它压根没有被积极赋形。但照护者的身体与精神会在长期缺乏公共承托中耗尽。这是一个比“枯竭”更残酷的结构：赋形没有杀死发生，它杀死了人。

也正是因此，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的诉求在本文框架下呈现出内在的张力。一方面，它要求将照护从私人领域的消极赋形中解放出来，提升到公共领域获得积极承认——这当然是正义的。另一方面，本文已经展露了这一积极承认所携带的枯竭风险。这场运动因此陷入一个结构性困局：不向公共领域索要承认，照护者在物质上会继续被压榨至耗尽；索要承认，照护的发生性内核又有可能在被赋形之时受到侵蚀。这不是运动走错了方向，而是承认这一工具本身就具有不可消除的自反性。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后面章节要提出的“旁侧空间”策略为何形貌如此特异——它试图在“索要承认”和“拒绝承认”这个二元选择之外，凿出第三条路：制度性地保护那些不必被承认就能获得公共支撑的空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弗雷泽（Fraser, 1995）在同一时期对“承认与再分配”之关系的批判，与本文的关切深度交叉。弗雷泽诊断了“承认政治”如何被从再分配的政治经济批判中剥离出来，变成一种文化主义的身份诉求。本文的批判与之共鸣但取径不同：弗雷泽的靶心是承认政治对再分配的替代，本文的靶心是承认这个结构的自反性——即承认在配给资源的同时，内置了对被承认对象的生成能力的侵蚀。这两条线在分析上是互补的：弗雷泽告诉我们“不能只有承认没有再分配”，本文告诉我们“即使在承认和再分配同时到位的情况下，承认本身仍可能制造新的伤害”。

3.4 承认的细密化：当赋形下沉到每一次注意力的分配

过去二十年，随着信息技术与绩效管理工具的渗透，赋形/枯竭的机制已经从前福特时代的体力动作、福特时代的工时，下沉到知识工作者的每一次注意力分配和人际接触。教师被要求将每一次与学生的课外交流记录为“辅导学时”，医护人员被要求将每一次安抚病人的时间录入电子系统，研究人员被要求将每一次“跨学科交流”量化为合作论文的作者数和引用率。

与此同步，那些“不足认”的动作——教师与学生在操场边关于生命意义的那场对话，护士在深夜握住病人手心的四十分钟，两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在喝咖啡时碰撞出来的那个还完全没有形状的新问题——正在因为“无法录入系统”而在工作节奏中被边缘化。它们没有被禁止，但它们在制度反馈的引力场里被日渐判定为“不划算”。这意味着每一个身处这个系统中的人，都持续地面临和子式的选择：是继续做那件不能被系统看见的事，还是把时间和精力转移到能被记录、能换算成绩效的事情上？这不是一个戏剧性的、一次性的道德抉择；它是每天都发生的、微小的、看起来无关紧要的行为排序调整。而这些调整的累积效应，就是发生性的缓慢枯竭。这不是资本主义的单一恶果，这是现代治理术在其效率最优化的内在驱动下，将赋形颗粒度无限细化后必至的生态后果。

四、平台之下：承认的极端化如何抽空了再发生的种子

4.1 算法不是不承认你，是承认到了纳米级

平台经济通常被批判为“不把劳动者当人”——只当作可替换的原子化劳力。这个批判用不足认性的语言来翻译，恰恰说反了。平台不是不承认劳动者。平台对劳动者的承认精细到了纳米级：它认识到他的每一秒在线时长、每一条行驶轨迹、每一次刹车力度、每一个顾客评分。没有哪个工厂的监工曾对一个工人的劳动拥有如此全方位、实时、高颗粒度的承认数据。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承认的颗粒度太高了，高到了完全淹没了劳动者内部自我推进的探索空间。

让我们跟随一位具体的司机——姑且称他为老张，一位在深圳开了十五年出租车、五年前转向网约车平台的老司机——来追踪这个过程。[4]

老张在转向平台的第一年，仍然保留着许多旧习惯：他会凭经验判断哪条小路不堵，会在下午四点半刻意绕到那所小学门口（那里总有带孩子的父母打不到车），会在雨天降速时特意避开那几段容易积水的老街。他车里有一个小型保温箱，里面放着几瓶矿泉水——不是卖，是给那些看起来疲惫的乘客。这些动作，用本文的术语来说，是他的劳动的“不足认的部分”：它们没有一件能直接被计入平台的收入公式，但它们构成了他在这个城市里作为一个“活人”而非“驾驶员”的行为厚度。

平台算法的介入是渐进的。最初，老张只是注意到导航推荐的路线有时候比自己选的路更快——他半信半疑地开始跟导航走。第三个月，他发现自己的服务分因为两次“绕路”被扣了分——那两次恰恰是他凭经验走小路避开堵车。第六个月，他不再走小路。同一年，平台升级了派单算法，开始在司机之间根据服务分、在线时长、高峰接单率进行差异化派单。老张意识到自己每一次偏离推荐路线、每一次婉拒远距离订单、每一次暂停接单休息，都在被系统记录并以他无法精确预测的方式影响他接下来一天的收入。

这里发生的不是简单的“惩罚规避”。如罗森布拉特（Rosenblat, 2018）在《优步世界》中所揭示的，算法管理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它的不透明反馈循环：司机不知道具体的算法规则，不知道每一次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他们被迫进入一种持续自我优化的状态——不是优化“如何把乘客安全送达”，而是优化“如何让自己的行为被算法判定为合格”。这意味着老张的行为词典正在被算法悄悄重写。他的注意力从“城市的纹理”——那些只有常年在路上的人才能积累的、关于人流、天气、道路的默会知识——转向了“算法的信号”：服务分、接单率、高峰时段奖金。他不只是在行为上减少绕路，他正在丧失“判断何时应该绕路”的概念能力——不是因为他不会了，而是因为在他的行为生态中，“应该不应该绕路”这个问题本身已经不再由他来决定。他不再是一个“在城市的纹理里穿行了十五年”的人，而是一个“在算法的实时反馈中优化自己每一个动作”的驾驶员。

保温箱里的矿泉水喝完了——他没有再买新的。不是他不再想照顾疲惫的乘客，而是“照顾疲惫的乘客”这个动作无法在服务分体系中得到任何反馈，而“准时到达、高评分、高接单率”则可以。这

不是一个“去技能化”的故事——他原有的城市知识并未被剥夺。这是一个“枯竭”的故事：他原有的那些自主发生的行为芽蘖，在算法的持续光照下，一棵接一棵地枯萎了。而更致命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正在丧失长出新的行为芽蘖的能力——因为任何新的、尚未被算法定义的尝试，在平台的反馈体系里都会被标记为“无价值的”——不是被惩罚，而是被归入那个不算分的、因而在日复一日的生存排序中被无限推迟的“额外善意”。

4.2 场域的私有化：从互助网络到算法调度

旧出租车司机共享信息的微信群是一个典型的不足认场域：它不产生值数据，不被任何上级考核，不能折算为奖金。但它在客观上降低了整个群体的交易成本、风险预警成本与心理支持成本。平台用算法调度替代了这个场域的功能，并以服务分体系彻底原子化了司机。这一替代不是一个廉价技术对高成本组织的“效率提升”——它是把场域从一个不足认的自主领域，强制赋形为一套被算法完全表征、由资本独占所有决策权的封闭系统。

这个过程在司机的日常经验中是这样展开的。在平台进入之前，司机们有自己的交接班据点——老张会在交接时告诉老李“今天机场出来堵，建议绕西边”，老李会在第二天给老张带份早餐。这种互助不是被任何外部制度组织起来的，它是在几十次、几百次微小的互惠中自己长出来的。平台进入后，算法直接告诉每一个司机最优路线——不再需要老张。服务分体系让老李发现，他每一次停下来帮路边抛锚的同行，都会因为“在线不接单”而掉分。老李不再停车。交接班据点空了。互助网络在没有人宣告它解散的情况下，默默地散了。

这一过程需要被更准确地命名。平台在这里做的，不是“不承认”司机的互助网络。它做的是：将场域中所有能被数字化的功能——信息传递、路线优化、供需匹配——以算法形式萃取、私有化、并为每一次调用定价，而将所有不能被数字化的层面——信任、互惠、共同体的归属感——直接碾轧为无价值残渣。这是一种“承认吞噬”：承认机制吞掉了场域中一切可被表征的部分，并以自己的表征替代了场域本身；而被替代后的残渣，因为不在任何承认框架之内，就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劳动”的本体论范畴之外。司机的互助不再是一种“工作”，它变成了一种“在工作时间之外做的、不影响评分的人情”——而当“人情”与“评分”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内竞争时，前者毫无胜算。

4.3 抽空的发生学：从行为芽蘖到透明人

一个人之所以能在旧职业被摧毁之后重新建构新的协作形态，依赖的不是“可转移技能”——那是积木之间的置换——而是一种更根本的东西：他内心有没有未被承认机制完全阉割的行为芽蘖。芽蘖是那种你做了却不知道为什么做的冲动，是你某个问题长期萦绕的不安，是你某个人某种处境产生的超出职能范围的关切。这些芽蘖的共同特征是：它们在制度化光照打亮之前，已经由内部的不确定性驱动，自行生长了一小截。

被承认过度塑形的人，不是缺少技能。他是被承认得太精细了——他的注意结构、成功标准与自我叙事都已被训练成对某个外部奖惩信号的即时回应，以至于当外部信号突然消失（AI拆掉了那块积木）之时，他内部没有任何一个尚在颤动的小芽蘖能告诉他下一步往哪里挪。他只能坐在仓库里，等着下一块积木从不知道哪里的传送带上掉下来，掉进他的手里。那个开了三年网约车之后不再绕路、不再备水、不再与同行闲聊的老张，他不是一个变得更有效率的人。他是一个在算法的全光谱灯照下，被照透了的人。而透明人是不会发芽的。

五、药方的陷阱：UBI与再培训如何各自内置了枯竭的风险

全民基本收入（UBI）和再培训这两味药被广泛视为AI时代劳动危机的标准处方。它们各自来自不同的政治传统——UBI根植于分配正义与公民权利，再培训根植于人力资本理论与供给学派——但在一个深层结构上，它们共享同一个未经审查的语法：对待劳动的危机，方式是给劳动者配给“某种被承认的东西”——要么是货币，要么是技能证书。

本章的任务不是论证UBI和再培训“无用”（它们在多个维度上确实有用），而是追问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这两套各自来自不同传统、各自回应不同需求的政策方案，会在各自的内在逻辑中被推至同一个枯竭点？答案不在于它们的设计者犯了同样的错误，而在于它们共同运行在“承认/赋形”这套语法之内——而这套语法本身就内嵌着一个倾向：在超过某个临界区间后，配给资源的行为标准化效应会压倒支撑效应。

5.1 全民基本收入：无条件的货币转移如何仍然构成一种赋形

UBI的逻辑核心，是无条件地向每一个个体进行货币配给。它的核心规范特征恰恰是不赋形——不要求受领者从事任何特定活动，不审查其“劳动内容”。这似乎使UBI与本文的批判完全无关：如果制度不命名你的活动、不度量你的产出、不要求你汇报你的进展，它怎么可能会枯竭你的发生性？

这个反驳必须被非常认真地对待。UBI的设计意图，在很大程度上与本文的关切是同向的：将个体从生存压力下解放出来，为他创造“去摸索自己尚未能命名的方向”的空间。芬兰在2017-2018年进行的UBI实验（Kangas et al., 2019）也显示，受试者的整体幸福感与自主感有所提升。这些证据不能被无视。

但本文必须指出的是：UBI在其主体建构的层面上，仍然内置着一种赋形——虽然这不是它表面上施加的。UBI将个体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框定为“权利持有者与公共池之间的提取关系”。这一框架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在权利层面，它是正义的底座。但在劳动社会学的层面，这个框架同时也是一个主体位置的预设：它将个体建构为一个从公共池中提取资源的孤立单位。这是一个无协作体的承认：个体的存在、生存与尊严，被制度完整地承认了——但这一承认不涉及、也不需要他与其他具体的他人之间的任何实际的协作过程。

这里不是要说“UBI导致人不协作”——那是一个经验命题，可以在不同试点中得到不同的证实或证伪。这里要说的是一个结构性的风险：UBI的承认框架，本身并没有为“协作-发生”留出制度性的空间。它承认你作为一个人的权利，但不承认——也不要求承认——你在摸索中与他人之间正在发生的那些尚未命名的协作形态。这些形态在UBI的配给逻辑中是不被看见的——不是因为它们被禁止，而是因为它们不在这个配给框架的射线之内。一个个体可以在完全不进入任何真实协作网络的情况下，依靠UBI维持生存。这意味着UBI在逻辑上内置了一种可能性：它在支撑个体生存的同时，也可能温和地将个体移出了那片“只有通过与他人的具体碰撞、摩擦、被需要、再重建才能长出行为芽蘖”的土壤。

这仍然不是要否定UBI。对于大量被困在赤裸生存中的人来说，UBI是生命线——在这个层面上，它是无可替代的正义措施。本文要做的，是指出UBI在“保护发生性”这件事上的结构盲区：它把资源给到了个体，却没有同时在制度上保护那个“个体之间在混沌中相互摸索出新协作形态”的过程空间。UBI可以实现“人不饿死”，但它不能单独实现“人在不被定义的情况下长出新的协作形态”。后者需要额外的制度设计——即第六章将要提出的旁侧空间——来补充。

5.2 再培训：提前画好的积木如何维持了被定义者的位置

再培训的失效根植于同一语法。它赋予人的是一个已经被命名、度量、定价好的新技能包。这个技能包在本质上是一种提前完成的赋形——它预设了“你将要做什么”，并以此为据给你配给课程、师资和资格证书。它对受训者说：你不需要在混沌中自己摸索出你的新方向，我们已经帮你把下一个积木的样子画好了。

在不同福利国家体制下，再培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丹麦的“灵活保障”（flexicurity）体系将高水平的失业保障与强制性的培训参与捆绑，构建了一套“从旧岗位平滑转移到新岗位”的通道。德国的双元制培训将企业实训与学校教学深度耦合，为制造业工人提供了高度结构化的技能更新路径。新加坡的“技能创前程”（SkillsFuture）计划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了终身学习的学分补贴，允许个人在获认证的培训课程中自主选择。这些制度各自在提升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

但从不足认性的视角看，它们共同运行在一个更深的逻辑上：培训定义了你“将会成为什么”，从而取消了你自已摸索“可能成为什么”的前提——那个混沌期。丹麦的灵活保障之所以“灵活”，是因为它在旧岗位与新岗位之间的间隙期做得足够短、足够平滑；但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正是这个“短而平滑”的结构，系统性地消灭了个体在两个被定义状态之间可能经历的那个漫长的、不被定义的摸索期——而那个摸索期，恰恰是新的协作形态和个人方向最可能从混沌中结晶出来的相位。灵活保障的高效运转，依赖于一个前提：新岗位始终存在，且培训体系能够准确预测它的形态并为之批量生产合格的劳动力。但当AI以不可预测的方式拆掉整条职业链时，这个前提就崩塌了——而灵活保障体系在面对“下一个岗位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情境时，除了继续提供“上一个岗位”的培训课程外，没有别的语法。

新加坡的技能创前程计划在个体选择的自由度上似乎更接近本文的关切：它给你学分，你选课程。但这个“选择”仍然发生在“已经被认证的课程”的菜单里。你所选择的方向，全部是已经被命名、被度量、被定价、被赋予资格的现存技能包。在这个框架内，一个正在摸索“尚未被命名的新方向”的人，是无课可选的——不是因为他不勤奋，而是因为他的摸索还没有、也不应该急于收敛为一个可以被课程编号锁定的名字。再培训的语法对他说：你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受训者，直到你把自己的摸索翻译成一个菜单上的选项。而这个翻译，恰恰就是枯竭开始的地方。

六、旁侧空间：一种不追求看见的制度伦理

6.1 从承认到克制的认识论转向

如果赋形/枯竭是承认机制在超过临界区间后不可消除的内置张力，那么真正能保护发生性的制度策略就必然呈现为一个反直觉的形态：制度必须有意识地为自己划出边界——不是为劳动的新形态另立承认名目，而是为那些尚未（且不应被急于）命名的探索过程，保有一块不被制度光照侵入的阴影地。本文将这种制度策略称为“旁侧空间”框架。[5]

这里必须立即做一个区分，以澄清旁侧空间的规范基础不是什么。旁侧空间不是要保护一个前制度的、纯洁的“发生状态”——那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同时也是前现代的乡愁。本文已反复声明：发生从来不是在制度之外的某个伊甸园里自由发生的；发生本身就是制度与混沌的拮抗所结算出来的。和子握婆婆的手的冲动，不是从她DNA里直接长出来的；它是在她与婆婆十二年共同生活——这种共同生活本身就受到照护的性别分工、家庭制度的伦理框架、日本社会对“孝”的文化预期等多种制度性力量的塑形——中，从她的身体里长出来的。它的脆弱性，不在于它是“纯洁的”，而在于它的生长条件——一种制度承认的低分辨率状态，一种留有大量不确定空间的社会构形——正在系统性地被日益精细化的承认所取消。

因此，旁侧空间的规范基础不是“保存本真”，而是制度性的自限——对承认机器自我扩张倾向的结构性制衡。就像权力分立的制度设计，不是因为设计者相信存在一种“免于权力的纯净状态”，而是因为他们从历史中习得了权力天然具有集中化的倾向，因而需要制造内部的对抗力来阻遏其膨胀。同理，旁侧空间的制度伦理，不是因为相信阴影里天然长着好东西，而是因为观察到：现代治理的承认机制在其效率最优化的内在驱策下，具有将赋形颗粒度无限细化的内在趋势；而当这一趋势越过某个临界点之后，它就会系统性地消灭那些只能在未被完全定义的混沌中才能被结算出来的新形态。这是一种制度先承认自身认知限度的伦理——承认自己不可能知道所有值得被保护的东西长什么样，因而必须在自己的治理权限内部划出明确的、受法律保护的“不治理区”。

这一自限伦理与洛雷（Lorey，2015）在《不安全状态》中诊断的“预防性治理”形成了精确的对跖。洛雷揭示了当代治理如何以“预防风险”为名，将安全作为一种权力技术渗透到个体的全部生活领域，制造出一种普遍的“治理性 precariousness”——不是保障太少了，而是保障的精细化本身制造

着新的脆弱。本文的不足认性批判与洛雷的治理性 precariousness 批判在诊断上高度兼容，但在规范指向上分道而行：洛雷的方案是揭示这种治理的暴力，并在其缝隙中寻找“出走”（exodus）的可能；本文的方案是在治理体系内部，以制度的方式——即公共基金、法律禁令、公地信托——为不被承认的过程刻出受保护的空间。不是出走，而是自限。

6.2 旁侧空间的具体制度杠杆

旁侧空间不是无政府主义。它是一种精确的制度安排，其核心机制不是“不给资源”，而是将资源配给与行为标准化之间的锁链切开。具体而言，至少有三条可操作的杠杆。

其一，无报告期段。在特定的、制度保障的时期内——譬如一个公民每十年可以获得三年不需要向任何行政机构提交“劳动成果报告”的制度间隙——个体可以从公共基金中获得足以维持基本生存的配给，但这些配给的给予不以任何关于其“劳动内容”的审查为前提。关键设计在于：这不是“你去干点啥，干完了回来汇报”。这是“你不需要告诉我们你干了啥，你只需要活着，我们信任你正在以自己尚未能命名的样式摸索着”。这使得在此间隙内进行的所有探索，都从一开头就被制度性地保护于不足认状态——没有人会来为你定义这些，所以你必须自己定义；没有人会来为你的摇摆质疑奖惩，所以你的摇摆被接住了、而不是被纠正了。普惠性意味着：一个开了十年网约车的老张，同样有权停下方向盘，走进那个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告自己在干什么的间隙里。他会不会立即释放出创造性的波浪？很可能头一年都是空白的、焦虑的、甚至让他更痛苦。但这恰恰是本文一再强调的：发生性不是一种躺在体内的现成技能，而是一种只能在被容忍的混沌中重新试错的、缓慢的生长。他需要的不是在间隙里“立即有用”，而是制度有足够的耐心允许他很长一段时间“看起来没用”。

其二，匿名成果池。当前的开源社区、种子银行、公共知识库已经是某种程度的不足认场域：贡献者无法单凭自己的贡献向任何机构索取相应的直接经济回报，但贡献被公共使用。旁侧空间政策框架可以有意识地将这一逻辑制度化——由公共基金支持的匿名成果池，允许任何人以不具名方式向其中投放作品、代码、设计、数据，贡献者不能以这些投放作为向基金会申领个人津贴的凭证。这一设计的核心目的是故意切断“投放-回报”的直接锁链，从而将投放动作的动机尽可能推回到内部不确定性一侧。匿名不是为了一无所获——成果仍然被公共使用，贡献者的名字仍然可以在同行中被传颂——匿名是为了切断那个“投放→申领资格”的行政链路，从而防止“投放”本身被“申领资格”的目标所捕获。

其三，不可评估区。在一些特定的公共空间——由公地信托持有的物理空间，或由社区信托持有的数字平台——明确以法律形式禁止导入与传统岗位绩效结构相似的评估与排名算法。这并非禁止组织（人们在这些空间里仍然可以自由地形成协作），也不是禁止评估（如果有人愿意做同行评议，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而是禁止将评估结果做成一种算法分配的自动奖惩机制。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平台通过实时承认数据反馈来重塑行为生态的技术通道，让协作关系重新掉回不足认的、需要人与人之间通过漫长的非正式调适来维持的那个缓慢节奏里。

6.3 旁侧空间与承认式改革的相容边界

这里必须做一个精确的划线，否则本文可能被误解为“反对一切承认”，而那种立场是虚无主义的。旁侧空间策略绝不是对所有承认式改革的替代。对于那些发生性已经很低、或被排除在一切保障体系之外的劳动——标准化岗位上的工人、零工经济中不被任何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承认式改革（改善最低工资、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统一合同标准、反歧视立法）仍然是必要的，而且在主要方面不会伤害发生性，因为这些领域里本就没有多少发生性可以被伤害。

旁侧空间针对的是那些仍然保有高发生性或正处于发生性再激活关键期的地带：正在离开旧积木、试图摸索新形态的人群；那些从一开始就在创造性、照护性、协作性领域里活动的个体。在这些地带，承认式改革必须有意识地与旁侧空间政策形成搭配：承认改革负责兜住底线（让你不坠入生存崩溃），旁侧空间负责保住上限（让你不滑向被定义完毕的积木）。二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协同关系，但其间有明确的非对称性：承认改革的每一次细化，都对旁侧空间构成潜在的侵蚀——因为精细化的承认会引入更密集的命名、度量和评估，而这些正是旁侧空间试图从特定领域中排除出去的东西。因此，应该在制度设计上赋权给旁侧空间的监护机构（如独立的公地信托），使其有权对承认式改革的细化提案进行“不足认性冲击评估”——就像环境影响评估一样，要求改革者证明其细化不会显著减少特定群体的不足认行动空间。这不是阻止承认改革，而是为它设一道必须经过的关闸。

七、检验与自限：可证伪的实证路径与对最棘手质疑的正面回应

7.1 检验本文命题的实证路径

本文的核心假说——承认度与发生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命题，它同时是一个可以被经验检验的假说。鉴于本文的案例均为合成的思想模型，有必要在此明确勾勒出检验这一假说的实证研究路径，以向读者展示发生学命题如何能够被操作化。[6]

一个可行的准实验研究设计是：选取照护制度承认度存在系统性差异的国家组进行比较。譬如，瑞典的居家护理津贴制度的评估维度相对宽泛，照护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了对“如何照护”的自主判断空间；而日本的长期照护保险（介护保险）则以其极为精细的评估分类著称，照护服务被切分为数十个可编码的动作单元。如果本文的假说成立，应能在日本照护者样本中观察到显著更低的“非任务导向的自发照护行为”频率——即那些不属于津贴计点项目、完全由照护者基于对被照护者即时状态的判断而主动做出的照护动作（如和子式的深夜握手、即兴的情感安抚）。

这一跨国的直接比较必须面对混杂变量的挑战：日本与瑞典之间不仅评估颗粒度不同，两国在照护文化、性别分工、家庭结构、以及福利国家体制的整体逻辑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一个更稳健的研究设计应该在两国各自内部进行：选取同一国家中享受不同等级津贴评定——因而照护服务的评估颗粒度不同——的照护者群体，测量其非任务导向行为的差异。如果本文假说正确，应能

在津贴等级较高（即承认度较高）的照护者中观察到显著更低的非任务导向行为频率，且这一效应在照护年限较长的群体中更强（因为枯竭的累积效应需要时间来显现）。两个层面的证据若方向一致，就能为倒U型假说提供比单一跨国比较更坚实的经验支撑。

同时，为了检验本文关于旁侧空间政策有效性的主张，另一个可操作的研究设计是：对那些已经实施了某种形式的“无报告期段”或“匿名成果池”的地区（例如某些提供无条件基本收入试点的社区，或长期以公地信托形式运营的开源社区），进行跨时间的行为追踪。如果旁侧空间确实保护了发生性，应能观察到受益群体在进入保护期后，其非任务导向的、跨领域的探索性活动总量与新型协作形态的生成率显著高于在同样时间内仅享受承认式改革（如标准化的再培训与求职辅导）的参照组。

7.2 回应最棘手的质疑

质疑一：如果承认是主体形成的构成性条件，那么你预设的那个先于承认的、自足的“内部冲动”是什么？它难道不是自由主义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残余吗？你的“旁侧空间”是否仍然是一种承认形式——即消极承认——如果是，它与马尔科所说的“边界划定”有何根本不同？

这是来自承认理论传统本身的最有力的反驳。霍耐特和巴特勒都论证过：没有承认，就没有主体——主体是在被他人承认的过程中才得以构成自身的。如果这一论证成立，那么本文所谓的“发生在制度灯照之外的内部冲动”似乎就是一个可疑的前社会、前制度的东西——这正是批判理论传统努力要拆除的那种“本真自我”的神话。

本文接受这一反驳中肯的部分：本文所说的“内部冲动”，确实从来不是纯粹的前社会本能。它本身就是在先前发生的承认-拮抗交互中结算出来的残余张力。和子握着婆婆的手的冲动，不是从她DNA里直接长出来的自发反射；它是在她与婆婆十二年的共同生活中，在一轮又一轮照护的试探、失败和摸索中，逐渐从她的身体里生长出来的一种“知道怎么做却不知道为什么知道”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并不是“免于一切社会构形的纯粹内部”，而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构形状态——即构形处于低分辨率、留有大量不确定空间的条件下——才得以生发和维持的。

但这一回应仍需更勇敢地面对质疑的核心。马尔科的反驳会继续追问：如果“内部冲动”本身就是承认的产物，那么你实际上是在主张一种特定的承认形态——一种低分辨率的、留有阴影的承认。这岂不是把你的整个理论推回了“更公正的承认”这个框架之内——只不过你主张的公正，是一种有意的承认不足？

本文对此的回答是：是的，“不足认性”所保护的确实不是“承认之外”的东西，而是一种特定的承认相位——即承认尚未被精细化的那一刻。但这不是退回了马尔科的框架。马尔科追问的是：承认的边界应该划在哪里——如何让边界更流动、更开放、更不排斥？本文追问的是：在劳动的领域，承认这个语法本身——不论边界画得多流动——是否都内置了一个枯竭效应，这个效应在承认分辨

率越过临界点后就会系统性释放？马尔科的方案仍然是重新划定边界：让那些被排除的人被纳入承认。旁侧空间的方案是制度性地退出承认：故意不进入某些领域的承认逻辑，不是因为那些领域里没有什么值得承认的，而是因为承认这个动作本身会对那些领域里的发生性造成系统性的伤害。这两者的差异不是“更好的承认”与“更差的承认”之间的程度差异，而是“承认”与“不承认”之间的范畴差异。

因此，旁侧空间不是一种“消极承认”——它不是在说“我承认你是某种不可被承认的东西”。它是在说：在这个被划出的空间里，制度放下它的命名工具和度量尺，不是因为看不到，而是因为选择不看到。这不是承认的一种形式，这是承认的主动中止。

质疑二：不足认性的可证伪性听起来很弱——你怎么测量“发生性的枯竭”？是不是每一个案例都可以被事后解释成“承认过头了”？

这是一个必须在方法论上诚实面对的问题。本文已在7.1节给出了具体的证伪路径，这里进一步补充说明。在行为科学中，许多核心构念——如“内在动机”“创造力”“幸福感”——的测量都依赖于间接的行为指标和自陈问卷。这并不妨碍这些构念所支撑的理论框架被广泛接受。本文的“发生性”在方法论上并不比这些构念更不精确。它可以通过一系列可观测指标来间接测量：非任务导向行为的频率与持续时长（行为日志）、行为的内部驱动程度（经验抽样法中的自陈问卷）、行为芽蘖的多样性（跨领域活动的种类数）、新型协作形态的生成率（社区网络分析中的边增长）。这些指标各有其局限，但它们的组合能够勾勒出一幅比任何单一指标更可靠的“发生性生态”图景。

此外，本文已在结论部分给出严格的证伪条件：若实施旁侧空间二十年后，受益群体的非任务导向探索行为与新型协作生成率相较于仅推行承认式改革的对照组并无显著差异，则本文关于“不足认性是发生性劳动的构成性条件”的核心命题需要修正。这一条件不是修辞——它指明了在什么情况下，本文的判断需要被放弃。

质疑三：旁侧空间听起来就是给那些“已经在做有趣的事”的人放假，而对那些还在流水线上的 人关上了门——它会不会固化既有的阶层分化？

这恰恰是本文要把旁侧空间设为“普惠性制度间隙”而非“按已有成就选拔”的原因。普惠性意味着：一个开了十五年网约车的老张，同样有权停下方向盘，走进那个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告自己在干什么的间隙里。他会不会立即释放出创造性的波浪？经验告诉我们，很可能头几次尝试都是空白的、焦虑的、甚至让他更痛苦。但这不是放弃普惠性的理由——这正是普惠性必须被坚持的理由。如果一个制度间隙只对“已经被证明有创造力”的人开放，它就不是在保护发生性，而是在复制既有的文化资本的分配结构。真正的发生性保护，恰恰是在一个人自己都还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的时候，就已经为他保有一块不被要求证明自己“将会做什么”的空间。

质疑四：你给旁侧空间的辩护听起来像是在主张一种制度性的撤退——但历史上每次制度撤退，最受伤的总是那些最需要制度保护的人。你如何区分“克制的承认”和“冷漠的不承认”？

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质疑，也必须是任何自限性制度设计都要面对的硬问题。本文给出的回答是：克制的承认与冷漠的不承认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承认的“量”，而在于谁在承受资源被切断的后果。在冷漠的不承认中，制度从弱势群体那里撤回资源，将他们暴露在市场的纯粹暴力之中——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惯常操作。在旁侧空间中，资源配给并未被切断——无报告期段的生存配给是公共基金保障的，匿名成果池的运维是由公共财政托底的，不可评估区的物理空间是由公地信托持有的。资源没有消失，消失的是资源配给所附带的行为标准化要求。这恰恰是需要最强有力的公共制度才能做到的事：不是撤回公共资源，而是在提供公共资源的同时，克制自己不去规定这些资源的使用者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事。这比简单地“给钱不管”要难得多——后者是新自由主义的懒惰，前者是制度在自身权力最膨胀的时刻所做的自我限制。它不是制度的撤退，它是制度的一种更高级的、更有自反性的自我运用。

八、结论：在制度内部为混沌留一扇门

本文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命题：AI时代真正需要被保护的，不是某一种特定的劳动形态，而是劳动过程中那种尚未被外部目标完全定义、由内部不确定性自我推进的能力得以维持的制度性条件。一种行动的“发生性”——即它由内部不确定性驱动的程度——在制度赋形越过某个临界区间之后，会被承认的精细化所置换。这一置换的过程不是任何人的恶意，不是哪个制度设计的偶然缺陷，而是承认机制本身在效率最优化的驱策下，将赋形颗粒度无限细化时所内生的一个结构性的拮抗效应。这不是一个可以被“更公正的承认”消解的悖论，因为悖论的根源不在承认的公正与否，而在承认这个动作本身——它命名、它度量、它配给资源——在超过临界点后，会系统性地行动的方向源从内部不确定性转移到外部既定目标。

本文拒绝将这一诊断浪漫化。没有任何前制度的“本真劳动”曾经存在过，今后也不可能存在。发生从来不是在制度之外的纯白画布上展开的；它永远是在制度与混沌的拮抗中，在承认的粗细不同的分辨率之间，被结算出来的。本文要保护的，不是某个想象中的、未被制度污染的“纯粹发生”，而是拮抗本身能够继续发生的条件：即制度的光照还没有覆盖掉所有混沌，还有足够宽的阴影地带让新的、尚未被命名的行动形态能在不被提前定义的前提下，先长出自己的轮廓。

这是旁侧空间的规范核心——不是保护一种本质，而是制造一种制衡。制度的承认机器被其内在的精细化惯性推着走向全覆盖；而全覆盖的终点，就是每一个人都被承认得无比精确，却再也没有人能发起一件未被提前定义过的事情。旁侧空间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自限机制，在承认机器的扩张路径上设了一道必须停住的关闸——不是因为关闸后面有一个天堂，而是因为我们从三百年来的岗位发生史中已经足够清楚地看到：当承认的灯照亮了一切，发生性并不是变得更茁壮，而是失去了

呼吸的缝隙。

这个判断本身在什么条件下可能是错的？这正是本文必须正面给出的证伪条件。

如果在实施旁侧空间政策二十年后，受益群体的行为日志显示其非任务导向的、自发性探索行为的总量与丰富度，相较于仅推行精细化承认改革（如改善津贴评定、扩大技能认证目录、细化照护评估维度）的对照组，并无显著差异——那么，本文关于“不足认性是发生性劳动的构成性条件”的核心命题就需要被修正。届时，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人的生成性冲动或许不如本文所预设的那样，对承认的枯竭效应具有特殊的脆弱性；它也许能够承受比本文所认为的高得多的承认精细化程度而不失去其内核——而如果这一反例被观察到，本文的诊断就必须降格：不足认性不是发生性劳动的构成性条件，而只是在某些特定制度文化中才会被触发的、有条件的风险因素。

同样，如果在准实验研究中，同一国家内部津贴等级较高（即承认度较高）的照护者，其非任务导向行为的发生频率并不显著低于津贴等级较低的照护者——或者，如果这一差异存在，但其效应量极小且不随照护年限累积——那么，本文关于“承认度越过最佳点后发生性下降”的假说就需要放弃。更进一步，如果跨国比较研究显示，在那些制度性地保护了旁侧空间（如无报告期段、匿名成果池）的地区，受益群体的跨领域流动率与新型协作形态的生成率并未显著高于仅有承认式改革的参照组——那么，本文关于旁侧空间政策有效性的主张就需要被重新评估，旁侧空间不过是一种被高估的制度浪漫主义。

但在这些反例被系统地观察到之前，我们有义务把承认机器在不断精细化中向前滚动的轮子，在它即将碾过下一片尚未被命名的探索之前，喊一声“停下”。

如果照护必须被命名为“劳动”才能获得资源，如果摸索中的人必须先讲清“我在创造什么”才能不被评价体系判为无业游民，如果一个社区非正式的互助网络必须先被标准化为一套可量化的指标才能获得公共资金——那么，制度每一次正义的赋形，都在把它试图保护的那个对象的原生发生性，一点点地置换为一种可以被管理、被审计、被优化的标准化流程。最后剩下的，是一套滴水不漏的、全面公正的承认机器，和一群被承认得无比精确、却再也无法自主发起任何一件未被提前命名的事情的人。

旁侧空间是不追求看见的制度伦理。它的核心原则不是“终于承认了所有被遗漏的形态”，而是在制度内部，为那些必须在尚未被命名的混沌中才能存活的发生，留一扇不被任何顶灯照射的旁门。这不是田园牧歌，不是反对制度本身，更不是放弃对不义的抵抗。这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清醒承认：人的创造、照护与协作，在其发生性的源头上，始终需要一种不被外部目标完全定义的空间——不是永远不被定义，而是在被定义之前，有足够长的阴影期让芽蘖先长出它自己的形状。一个太努力于看见一切的制度，会让人慢慢忘记，在灯照不到的地方，有些东西正在生长——不是因为它不应该被看见，而是因为被看见的那一刻，它就停止生长了。一个成熟的制度，不是照亮所有角落的

制度，而是知道应该在哪些角落、永远不打开顶灯的制度。

注释

[1] 本文所涉照护者“和子”与网约车司机“老张”等人物与具体情节，系基于多个真实事例进行匿名化、情境合成与叙事简化后的思想模型，其功能在于呈现赋形/枯竭机制的日常运作逻辑，而非经过系统田野调查的实证材料。案例中的制度细节（如日本长期照护保险的“身体介护”分类、网约车平台的服务分规则）参照了相关公开政策文件与报道，但人物与事件均为虚构，不指向任何真实个体。

[2] 关于挤出效应：本文对自决理论（SDT）的援引仅限于其“外部奖赏可能损害内在动机”的经典命题（Deci & Ryan, 1985）。需特别指出，自决理论在后续发展中——特别是在“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的子框架中——已经区分了“控制性”与“信息性”的外部反馈，并论证了“自主性支持”可以在不损害内在动机的前提下引入外部结构。本文对SDT的讨论仅以早期经典命题为参照进行划界，旨在展示不足认性与挤出效应在解释机制上的不可互换性，并非对SDT整体框架的全面评述或否定。一个更完整的处理将需要专门分析SDT的“自主性支持”概念是否能够部分缓解本文所诊断的枯竭效应，但这一分析已超出本文的范围，留待后续研究。

[3] 关于治理术：本文所使用的“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概念，特指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1977-1978）讲座中所阐述的以安全装置（dispositif de sécurité）为核心的权力技术（Foucault, 2004），重点是其通过调节人口的自然性来运作权力的方式。福柯后期在《主体解释学》等著作中对“自我技术”和“说真话”的讨论，因其所处理的是伦理主体化过程，与本文的“劳动发生学的制度条件”分属不同分析层面。本文在第2.1节的第二重剥离中已明确这一区分：福柯的“自我技术”是伦理主体的自我修炼，而本文的“发生性”是劳动行为在制度低分辨率条件下从身体里长出的即时判断力——两者在“不被治理”这一点上有交叉，但所指的过程与领域不同。

[4] 关于平台劳动的民族志背景：本文对老张案例的分析，部分参照了罗森布拉特（Rosenblat, 2018）在其著作《优步世界》（Uberland）中对平台算法管理的民族志研究。罗森布拉特揭示了算法不透明反馈循环如何系统地重塑司机行为，但她的分析重心在于算法的控制技术及其对劳权的影响。本文在接续这一分析的同时，将分析推进到“算法承认如何重构劳动者对‘什么是值得做的’的本体论判断”这一更深的层面，这与罗森布拉特的关切交叉但不重合。需要声明：老张的具体叙事为本文基于多源素材的合成建构，其功能为思想模型而非民族志个案。

[5] 旁侧空间的制度设计推演：本文所提出的“旁侧空间”框架（无报告期段、匿名成果池、不可评估区）系基于“不足认性”假说的规范推导，而非已付诸实施的政策方案。其可行性有待在具体社会语境下进行试点检验。需特别说明，旁侧空间并非主张国家从保障责任中撤退，而是试图在维持公共资源供给的前提下，将资源配给与行为标准化之间的锁链结构性切开——这是对制度能力的一

种更高级运用，而非简单的“不管”。此外，这一框架与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等既有替代性经济实践之间的关系，亦需在未来的经验研究中进一步厘清。

[6] 可证伪性设计与方法论诚实声明：文中所设的证伪条件（如实施旁侧空间二十年后与对照组比较、日本与瑞典照护者行为差异的准实验设计等），是为“承认度与发生性呈倒U型关系”这一核心假说预留的经验检验入口。该假说目前为理论模型，其操作化需后续专项研究设计——包括对“发生性”的多个间接指标（如非任务导向行为频率、行为内部驱动程度自陈报告、新型协作形态生成率等）的联合测量，以及对混杂变量（如照护文化规范、性别分工结构、福利国家体制类型）的系统控制。本文并不声称该假说已获实然验证，而是将其作为有待检验的命题明确给出。在行为科学中，许多核心构念的测量同样依赖间接的行为指标，本文的“发生性”在方法论上并不比这些构念更不精确——它的不确定性，来自于它试图捕捉的是一个本质上抗拒被精密测量的对象，而这恰恰是本文所辩护的那一类“不足认性”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层面的对应。

参考文献

- Braverman, H.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urawoy, M.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tler, J. (1997).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ci, E. L., & Ryan, R. M. (1985).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Plenum Press.
- Foucault, M. (2004).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Paris: Gallimard/Seuil.
- Fraser, N. (1995). From Redistribution to Recognition? Dilemmas of Justice in a "Post-Socialist" Age. *New Left Review*, 1/212, 68–93.
- Honneth, A. (1992). *Kampf um Anerkennung: 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t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Kangas, O., Jauhiainen, S., Simanainen, M., & Ylikännö, M. (Eds.). (2019). *The Basic Income Experiment 2017–2018 in Finland: Preliminary Results*. Helsinki: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 Lorey, I. (2015). *State of Insecurity: Government of the Precarious*. London: Verso.
- Markell, P. (2003). *Bound by Recogn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olanyi, M. (1966). *The Tacit Dimens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Rosenblat, A. (2018). *Uberland: How Algorithms Are Rewriting the Rules of Work*.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ott, J. C.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F. W. (1911).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